

■中国古代文学

胡适与 20 世纪的中国词学

陈 水 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水云(1964-),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词学研究。

[摘 要]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 给 20 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 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有反对者, 亦有拥护者, 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世纪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 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 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 直到 80 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 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 而成为 20 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关键词] 胡适; 词学; 20 世纪; 论争; 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1-0116-08

关于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 过去关注较多的是他的古代小说考证, 其实, 胡适的词学研究也为 20 世纪的中国词学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近年来, 已有学者指出: 胡适的“文学革命”, 对传统词学的变革有着重要意义, 它进一步张扬了“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思想, 推动了王国维意境说向风格论方面发展, 造就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旗帜下的词学研究新人, 结束了词学研究长期以来为传统学者垄断的状况, 也使词学研究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和转型。那么, 胡适在 20 世纪词学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推动 20 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一、胡适与清末民初的词学

在 20 世纪最初的 20 年间, 传统词学研究在继续发展着, 此时执词坛之牛耳者为“清末四大家”。“清末四大家”总的理论倾向是推衍常州词学, 接受的是常州派“意内言外”之说, 强调的是词的“比兴”“寄托”功能。这一思想突出了“词”与“诗”两种文体的共通性, 将词与社会政治生活联系起来, 对提高词体的文学地位固然有着积极意义, 却限制了人们对词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审美品格之认识。1908 年 11 月至 1909 年 2 月,《国粹学报》以三期的篇幅刊载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它引进西方先进的学术理念及研究手段, 提出“写境”与“造境”、“理想”与“现实”、“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一系列新人耳目的审美见解, 它以“意境”为词学批评的基本标准, 以“真性情”、“真景物”为意境的精神内核, 使词学从常州派的伦理批评转向审美批评的道路上来, 为沉闷、冷寂、保守的晚清词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但是, 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 王国维随罗振玉流亡日本, 他的《人间词话》在当时未能产生如后来那样的轰动效应, 大多数学者依然坚守常州派以比兴寄托论词的立场。对于清末民初词坛出现的两种

词学倾向，胡适是坚定地站在王国维变革传统词学的立场上的，他接过王国维的文学进化论思想和“意境”说，向坚守“比兴”、“寄托”观念的守旧词坛发起新一轮的冲击。胡适对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有比较深刻的了解，1917年他从美留学回国后，在上海考察出版界后得出的结论是：近几年的学术界“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1]（第3页）。1922年，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对王国维治学的敬佩之情，称王国维是当时“旧式学者”中学问做得最好的一位。1923年，他在编注《词选》的时候，曾写信向王国维请教“鸡坊拍袞”诸问题，还把自己的论文《词的起源》初稿送呈王国维指正。“在这时，胡适向学界充分表明，他的词学研究成果中，有王国维的直接介入。”^[2]（第37页）很显然，胡适对词学问题的研究，与王国维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谷永说：“胡氏生后于先生（王国维），而推先生之波澜者也。先生之于文学有真不真之论，而胡氏有活文学死文学之论；先生有文学蜕变之说，而胡氏有白话文学史观……先生论词取五季北宋而弃南宋，今胡氏之《词选》，多选五季北宋之作。……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之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虽谓胡氏尽受先生之影响可也。”1934年，在洛阳师范学校任教的任访秋，亦从论词体演变、对时代之批评、批评之标准、对咏物词之见解、对文坛上之影响等方面，探究了胡适与王国维词学观的“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之处”。直到1998年在澳门大学任教的施议对，在其所《人间词话译注前言》中指出，胡适编撰《词选》，鼓吹词史上的解放派，赞扬苏、辛，贬斥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以为有意境的词可不管音律，“这都是从王国维的境界说引申出来的”。但胡适对王国维思想更有其超越的一方面，他曾在给任访秋的回信里谈到自己思想与王国维的相异之点：“你（指任访秋）的比较，太着重相同之点，其实静庵先生的见解与我的不很相同。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我们分时期有不同在此。他的境界说也不很清楚，如他的定义，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我所谓‘意境’只是一个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看法）。 ”^[3]（第433-434页）

胡适对王国维的思想是有继承也有超越，对于“清末四大家”则主要持批评态度。1922年3月3日，他撰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长篇论文，谈到他对清末至民初（1872—1922）50年间词的看法。他说：“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吴文英）派的毒，很少有价值。故我们不讨论了。”这里指的正是“清末四大家”领导和影响下的晚清词坛，自道光十二年（1832）周济编《宋四家词选》以来，吴文英在晚清词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王鹏运称：“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朱祖谋谓：“君特（吴文英）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故其为词也，沈遂缜密，脉络井井，缜幽抉潜，开径自行，学者匪造次所能陈其义趣。”郑文焯也认为：“君特为词，用俊上之才，别拘一格，拈均习取古谐，举典务出奇丽，如唐贤诗家之李贺，文流之孙樵、刘蜕，锤幽凿险，开径自行，学者匪造次所能陈其细趣也。”^[4]（第293页）况周颐论词推衍王氏“重、拙、大”之说，以“重”为“拙”与“大”两种体格之本，而“重”之体格于梦窗词表现得最为充分：“即其劳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5]（第4447页）“清末四大家”中以朱祖谋学梦窗最能得其神髓，王鹏运说：“世人知学梦窗，知尊梦窗，皆所谓但学兰亭（王羲之）之面；六百年来，真得髓者，古微（朱祖谋）一人而已。”^[5]（第4690页）但在胡适看来，吴文英《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没有什么‘诗的情绪’或‘诗的意境’作个纲领”^[6]（第287页）。因此，他称吴文英及南宋以至元初的词为“词匠的词”。所谓“词匠的词”，就是模仿前人的形式，丢掉了创作的精神（性灵或意境），“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6]（第6页）基于这样的认识，胡适当然要批评近代专学梦窗的时代风气，认为“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但是，胡适对“清末四大词人”的词籍整理业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五十年来的词，虽没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鹏运（临桂人）、朱祖谋（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词学，翻刻宋、元词集，却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朱氏《村所刻词》，吴氏的《双照楼词》，都是极可宝贵的材料。从前清初词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见的词集，现在都成了通行本了。”^[7]（第264页）他对“清末四大词人”的创作评价不高，却对他们的词学成就

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也表明胡适是把“清末四大词人”的创作实践与学术研究区别看待的。

二、胡适与“体制内派”的词学

胡适对现代词学研究的介入,特别是他发表的惊世骇俗之论,给 1919 年以后的词学界以极大震动,杨海明先生曾将胡适形象地比喻为现代词学新变中的“革命党人”。一时间,词学研究的话题主要是围绕胡适而展开的,从而和者有之,激烈反对者亦有之,胡明先生将追随胡适词学观的学者称为“体制外派”,将对胡适词学观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学者称为“体制内派”。

首先站出来对胡适评价“清末四大家”表示异议的是胡先骕,他的看法见诸《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文中说:“至于词人,近五十年中亦多可传者,除朱祖谋外,多不学梦窗。胡君乃以为‘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派的毒,很少有价值的’,何胡君敢于作无据之断语也!他通过晚清各家创作的具体分析,一一辩驳胡适是作无据之断语。如王鹏运的词,‘高亢凄厉,有稼轩之豪放,而无其粗率’,与周济所言之学词途径若合符契,岂可说是‘中梦窗毒’者?文廷式的《云起轩词》,出入于苏轼、辛弃疾两家之间,与王鹏运之途径亦大相异趣,则更不能说他是‘中了梦窗派的毒’!郑文焯的词,‘澹远似白石(姜夔),沉着处似清真(周邦彦)’,也不能说它中了梦窗派的毒。即使是以学梦窗词知名的朱祖谋,其《村词》,得梦窗词之长,无梦窗词之弊,‘其风骨之遒上,清词中当推为巨擘’,‘惟耳食者闻其学梦窗,或便谓其中梦窗之毒耳。’最后,胡先骕总结说:‘总观清末四十年诗词,远迈前代,不惟嘉道时代所不及,且在清初诸名家之上,胡君独取金(和)、黄(遵宪)二家,诚有张茂先我所不能者矣!’胡先骕对胡适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但他认为清末的诗词越过嘉道、超于清初,就不免言过其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发表之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 年)论述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间段内的文学发展史,自然也免不了要对这 50 年间的词特别是对“清末四大家”和王国维的词发表自己的看法。钱基博(1887~1957)与胡适(1891~1962)年岁相若,但他的学术立场却是传统的,所撰《现代中国文学史》保持着旧式学者的治学风格,对于“清末四大家”的评价也与胡适的学术立场截然相反。他称赞王鹏运词:“幼眇而沉郁,义隐而指远”,说郑文焯“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上以考古燕乐之旧谱”,“故其词亦偏宗周邦彦、姜夔”。朱祖谋:“大抵寄绵密于藻丽,抒情感于比兴,而融诸家之长,声情益臻朴茂,清刚隽上,并世词家推领袖焉!”况周颐 17 岁以前之作,“轻倩流慧,理境两绝”,“逊国而后,家国之感,身世之情,所触日深,而词格日亦遒上,顿挫排宕,柔厚沈郁,千辟万灌,略无炉锤之迹,而又严于词律,一字一声,殊无乖舛。方之古人,庶几白石”。但他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却不置一辞,只说“自谓境界不隔,足追五代、北宋名家”,从这里亦可看出他对王国维革新清末民初词风的冷漠态度。

胡先骕、钱基博的意见只是当时学术界保守派的两个代表而已,更能说明这一时期体制内派学者对胡适关于词史分期的看法有分歧的是夏承焘和龙榆生。但夏承焘还只是对胡适所谓“歌者之词”提出异议,龙榆生则对胡适宋词发展三段论表示不敢苟同,并对胡适分期标准的可信性提出诘难和质疑。“吾人试依胡适所分三个阶段,以考求五代、宋词,虽大致可得相当之证验”,但在第一段落里,胡氏亦自知“南唐李后主与冯延巳出来之后,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词的境界,加浓了词的内容”,决非“歌者的词”所能范围,但为了使自己的看法能自圆其说,胡适便不得不强为之解说曰:“但他们的词仍是要给歌者去唱的。”但在龙榆生看来,如果说以曾给歌者去唱,则不足以为“诗人的词”,那么东坡、山谷、少游诸人之词,何尝不给歌者去唱?特别是少游词更是传唱尤广,不但“常常给妓人作小词,不失第一时代的风格”。至于东坡词,虽有“曲子律缚不住”之评,亦多数曾为妓女歌唱,此征之各家诗话笔记,斑斑可考者。以“要给歌者去唱的”,为即“歌者的词”而非“诗人的词”,“不但无以解于李后主,即苏门词人,恐亦不能确定属于第几阶段”。龙榆生还认为,胡适以“白石以后,直至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亦是“尤多语病”,在他看来南宋以后词原分两系:一系承周美成之遗绪,重在讲究音律,代表人物是姜夔、吴

文英、张炎；胡适说他们已“转到音律的专门技巧上去”，这样的表述亦不太精确，事实上，“白石、梦窗诸作品，尽有内容极深刻、悲壮、苍凉、哀艳，令人读之，哀感缠绵而不能自己者，胡氏特未之深究耳。”一系扬苏、辛之余波，疏于音律，代表人物有与稼轩并世的陆放翁、刘改之、陈同甫诸人，还有宋末的刘须溪，金之蔡伯坚、吴彦高、元遗山等，他们的词莫不激壮淋漓，为“诗人的词”之极诣；但胡适却只以刘后村一人为“诗人的词”之后殿。这些也让人费解不已。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胡适既以姜白石、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诸人为“词匠的词”，以他们为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则选录诸人之词，必取其匠心独运，结构严密，音律和谐，足以代表某一作家之作品，乃不失为历史家态度”。然而胡适所选，皆为姜、史、吴、张诸家“习见之调”，“集中得意诸阕，反被遗弃”，龙榆生认为既然胡适以“词匠的词”为不足取，那么在编撰《词选》时，对于姜夔诸人词，当悉加摈弃可也，但决不能舍长取短，以迁就他“个人的见解”，这一做法实乃“厚诬古人”。龙榆生对胡适分期标准的可信性的质疑，有合理之处，也确实指出了胡适理论不严谨处。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词学立场的分歧。

三、胡适与“体制外派”的词学

在“体制内派”对胡适形成围攻之势的同时，更有一大批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派学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革新旧词学的立场上。首先站出来支持胡适的是陈子展（1898～1990），他先后撰有《中国近代文学变迁》（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对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发表的观点给予肯定。他全盘地接受胡适的文学进化观，认为任何一种文体发展到一定限度，“方法用得愈纯熟，成了故套；规律变得愈严密了，成了枷锁；后来作它的人，为故套所范围，为枷锁所束缚，总不易写出有生命有价值的作品来”^[8]（第53页）。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他谈到自己对词史的整体认识是：“词体创始于唐，经五代、北宋、南宋，可算是它的发展极盛的时候。……到了近代，我们看到一班词人努力的结果，知道词的发展已到了一定的限度，真是不容易再做得有生气了，词已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8]（第53页）比如况周颐、朱祖谋的词，侧重声律，守律綦严，虽然做到声律不谬，却已失了创作的精神，“何况他们喜欢堆砌，晦涩难解，与吴梦窗同病，同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之讥？”^[8]（第58页）

然而，陈子展对胡适的偏激之论亦有所修正，他认为近代词人的词“固然多少中了梦窗派的毒”，但他们这些词人在近代文学史上实在有论列的必要，也就是说清末词家仍然有特殊的认识价值。比如王鹏运：“一生坎坷，饱尝世味，又值晚清秕政，观阅既多，受侮不少，故发而为词，苍凉慷慨，颇有才士不平、壮夫扼腕之意。他的词，虽然有时也好用替代字，也好掉书袋，像同时旁的词家一样，但他的魄力究竟大些，很能运用他的天才，故仍然很有个性，很有时代性。”^[8]（第55、56页）再如赵熙：“为晚出词人，而又别树一帜，与梦窗派殊调。……他既置身于山水清奇之地，故他的词，似从自然界的灵悟中得来。他描写景物之作淡朴自然，真是又多又好。……梦窗派拘于声律，堆砌晦涩，那能有此境界。”^[8]（第58、59页）陈子展还对胡适所未及评论的王国维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王国维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词人，“他的词做得不多，但很有境界，不为词律所拘束”^[8]（第60页）。这些论述较之胡适要温和些，理论价值也更高些，但他的词学立场显然是现代的。

1926年由胡适编选的《词选》，是其白话文学史观的一种“载体”，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选本主观性太强，然而，它并未因其微有瑕疵而销声匿迹，反倒在当时学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正如龙榆生所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编选的词史及各种文学史，如薛砺若《宋词通论》、胡云翼《词学ABC》、《中国词史大纲》、《中国词史略》，以及柯享伯《宋文学史》、陆侃如《中国诗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大多袭用胡适关于词史发展的三段论。“尽管它们对词史的分期和一些具体意见互有差异，但其基本观点却大都是从胡适那里‘批发’来的。”他们对胡适词史观的继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肯定苏轼革新词风的意义，一破过去以苏轼的“以诗为词”

为别派的看法。胡云翼说:“到苏轼便把词体的束缚完全解放了,他一方面超越了词学艳科的狭隘范围,变婉约的作风为豪放的作风,一方面又摆脱了词律的束缚,自由去描写……我们认定这种别派是词体的新生命,这种新词体离开了百余年来都是这样温柔绮靡的旧墟,而走向一条雄壮奔放的新路。”^[9](第 44, 45 页)陆侃如也认为苏轼是个转变词坛风气的人,“在辞句方面,他时常杂采诗赋语、经典语,甚至于以散文的句法入词。在内容方面,他以词调笑,以词咏古,以词写壮怀,以词叙幽情,‘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总之,他解放了词的束缚,扩张了词的领域。他这种‘天马脱羇’的作风固然引起了那些守旧而胆怯的文人的惊骇,但一时作者沛然向风也不少。”^[10](第 504 页)二是将南宋词分为“豪放”与“工丽”两派,或曰“诗人的词”与“词匠的词”两类,或曰“白话词”与“乐府词”两类,对豪放派词或南宋的白话词给予较高的评价,而对工丽词派或南宋的乐府词则多贬抑之辞。如柯亨伯便非常赞同胡适以“诗人之词”与“词匠之词”区分辛弃疾和姜夔的看法,认为词至辛弃疾“可谓造极登峰”,亦即“诗人之词”的极盛时期,词匠之宗非舍姜夔莫属^[11](第 484 页)。胡云翼也说:“白话词特别注意词的内容,乐府词特别注意词的表面,白话词是拿词来表现自己,乐府词是拿词来协音乐。所以乐府词兴,白话词便衰了。我们读了那些乐府词家的词,只看着华美的字面,铿锵的音调,完全没有南渡词人辛弃疾、陆游那一派感慨悲凉的作风了。”“他们这一派词人(指辛弃疾、陆游等白话词人)的好处,就是能够用活泼的文字,来表现作者的真性情。用词而不为词所使。使每一个词人的个性的风格,都能在词里面活绘出来,这一方面把词的应用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把词的文学价值也抬高了。”^[9](第 53 页)三是接受了胡适对明清词的看法,把明清作为词史发展的衰落期,以为这一时期的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胡云翼说:“大多数的清词家,不是模拟南宋,便是模拟北宋,有的拟五代,也有的拟晚唐。总之,无论他们怎样跳来跳去,总不曾跳出古人的圈套,清人的词,因此便堕落了,走上古典主义的死路去了。”^[12](第 215 页)像陆侃如《中国诗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赵景深《中国文学史》对宋以后的词更是略而不论。

当然,对胡适的词学观,他们并非只是“因袭”,而是将胡适的词学观进一步完善,从而构建了一套“体制外派”的词史。众所周知,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只论及唐宋白话词,他的《词选》也只选取唐宋时期的白话词,这些固然能鲜明地表现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但并不符合唐宋词发展的实际及真实风貌,陆侃如的《中国诗史》、薛砺若《宋词通论》、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国词史大纲》对胡适的这一做法有所修正,在重点论述白话词的前提下对非白话词有所分析,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唐宋词史发展的线索,也真实地反映了唐宋词史发展的历史轨迹。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更是一改体制外派学者撰写词史只写至南宋的作法,全面地描述了千年词史的发展历程,对明末及清代的词给予一定程度的好评,体现出一种比较宏通的历史视野和比较客观的文学史观,因而,它也就成为体制外派在新的文学史观指导下撰写的惟一一部通代词史。

四、对胡适的批判与文学史的改写

时间推进到 20 世纪 50 年代,学术界的理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 1954—1962 年的七八年间,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

1954 年,由两位小将发起,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很快地转入到对胡适学术思想影响的全面清算,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的文化运动。在这样的运动形势下,一些曾经受到过胡适学术思想熏陶的学者如陆侃如、游国恩,纷纷对自己早期的思想作了批判和反思。陆侃如认为通过学习,深深地感到过去所受胡适的影响铲除不尽,最后告诫大家说:“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受胡适影响比较深的人,更应该深刻警惕,加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来坚决地摧毁敌人最后一块阵地。”^[10](第 193 页)游国恩也说“五四”以来胡适的唯心论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面非常广泛,“那时多少青年,包括我自己,都被他诱惑,养成一种考据痴,在他是有意教人脱离现实,脱离政治,但他却从来没有脱离政治,国难当前,教我们埋头读书,不要跟着大家去呐喊,应该照易卜生说的做去:‘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13](第 201 页)。

1957年,由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转入对整个学术界思想倾向的批判。这场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宗旨的运动,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以批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所反映的思想变化最为典型。刘大杰在解放后曾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分析文学史的某些问题,在1957年改写本里已全部地删去了引用胡适观点之处,但大家普遍认为这次改写仍然承袭的是胡适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胡适文学史观的再现”。“如果说在刘先生的旧著中,大量地系统地宣扬的推崇胡适观点是并不奇怪的话,那么,解放至今,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了胡适反动的学术思想以后,刘先生改写的新书中,仍原封不动地保存了这些腐朽的东西,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14](第42页)为此,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文学发展史》所表现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批判运动。

综合当时各类批判文章,可知这些文章认为胡适思想对刘大杰文学史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代之阶级论;二是用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把文学的发展与生物的进化等同起来;三是重视艺术形式的分析,轻思想内容的分析;重唯美主义作家作品,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不谈阶级斗争对当时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在批判者看来,这种观点在对李煜、李清照的评论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李煜的作品都是描写凄愁哀苦、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情的,充满着个人的伤感。刘先生却说李后主“真实而又深刻地表现出那最普遍最抽象的离别愁恨的情感,把这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写得很具体很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艺术感受,得到了读者的共感共鸣。”还有李清照,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也只是哭哭啼啼,留恋已失去的过去,写出像《声声慢》这样幽怨悲苦的作品来。刘先生却说:“她的生活情感,也正是当日无数难民的生活情感。”批判者认为,照刘先生这样一说,统治阶级感情同性格和人民是共通的了!在他们之间没有阶级的区别,只有共同的“人性”。很显然,刘先生的这种错误观点和胡适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胡适也是闭口不谈阶级性的,他提倡‘人的文学’,认为文学是专门描写了阶级内容的‘人性’、‘人道’和‘人生’的。……刘先生正是蹈着胡适的后尘来评价文学的。”^[14](第10,11页)在这场运动中,刘大杰也作了自我检讨。他说:“解放后,我初步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我的思想上有了一些转变,我也初步发现了在这部书里的一些错误。但因为自己没有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立场,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肃清,所以在学习中进步很慢,理论水平仍然很低。《中国文学发展史》虽说在解放后作了一次修改,进步仍然很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仍然贯串在这本书里。”^[14](第276,277页)从1962年到1972年,刘大杰又先后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了两次改写,他说:“《中国文学发展史》印行以后,各方垂教甚殷,使我得益不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术领域里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在本书中所存在的一些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现在我又作了一些修改。”

平心而论,批判者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判是苛求刘大杰先生了,但这也让刘先生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的修改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结构布局、学术价值、时代色彩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学术价值较之1957年的修改本有了很大的提高。关于词学方面的表现就是充实了论述清词的部分,突出了陈维崧在清初词坛的重要地位,增补了对其词内容的分析,指出陈维崧的词,以抒写身世和感怀吊古者为佳,其中《纤夫词》更为反映民间疾苦的优秀作品。“作者以同情人民的态度,雄厚的笔力,描绘了封建统治者在战争时期强虏船夫,破坏生产的实际情况,在无力反抗的高压环境下,表现了丁男病妇忍痛告别和向神祈祷再归田亩的悲痛之情,可与李白《丁都护歌》媲美。”^[15](第1329页)在论述纳兰性德的部分,删去了纳兰性德与李煜创作的比较分析,这原是刘大杰论述清词最为精彩的部分,只是因为195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唐宋词小组,指责其评论李后主存在着非阶级观点和唯美主义倾向,作者只好在1962年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删除了这部分内容,还批评纳兰性德的词“内容多写个人情致,流于感伤”。但在1972年的修改本里,则明显地表现出学术研究屈从政治斗争的倾向,所以,这次改写比前一次更突出了重内容轻艺术的倾向。比如对李煜词的分析,1962年版还保留着比较浓厚的艺术分析的成分,认为对李煜词的思想感情性问题,应当从作者的主观思想与艺术的客观效果的结合上去考察。1976年版则完全以阶级分析代替艺术分析,说李煜在亡国前,大量剥削人民的财富,过着极端奢侈淫佚的生活,后来做了俘虏以后,他在精神、物质方面都感到痛

苦,只好“日夕以泪洗面”。在作品中发出哀伤凄若的情调,这实际不过是表现他个人荣华生活的幻灭而已。在他的眼里,只是他个人的私产。一旦私产丧失,生活穷困,他哭泣,他悲伤,这就是他的愁和恨。他的怀念“故国”,不过是追恋过去帝王的享乐生活,与人民和国家部没有关系,更谈不上表现了爱国思想。只是在最后,他才对李煜的艺术性作了简单的分析,说他善于锻炼语言,善用白描比喻的手法,把所谓抽象的“离愁别恨”,写得比较具体。

五、胡适词学观:潜在影响与重新体认

事实上,胡适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词学界仍有着潜在的影响力。施议对先生说:“五十年代以后,尊体派抬不起头来,解放体得势,胡适追随者才在大陆大量涌现。六十年代,胡云翼编辑《宋词选》,将宋词作家分为二派——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和以晏欧及周、姜等人为首的婉约派,这就是中国当代词学史上所出现的豪放、婉约‘二分法’……因此,词界产生了重豪放而轻婉约、重思想而轻艺术,以政治鉴定代替艺术评判的偏向。”^[16](第 219 页)也就是说胡适推崇苏轼、辛弃疾的思想,在新的形势下,胡云翼的推动下,发展为“重豪放而轻婉约、重思想而轻艺术”的倾向。所以说,“胡云翼的理论是二十年代胡适理论的具体化,也是近四十年来以豪放、婉约‘二分法’论词的突出代表。”^[16](第 38 页)

《宋词选》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了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以辛弃疾所选为最多,凡 40 首,苏轼次之,共 23 首,其它如刘克庄 12 首,陆游 11 首,朱敦儒 9 首,刘过 6 首,还选录了为朱祖谋所忽略的岳飞、胡铨、陈与义、向子諲、吕本中、文天祥等人爱国词,对朱祖谋选录较多的晏殊、晏几道、柳永、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则选之较少,它们选量之比分别是 10/5、15/4、13/7、22/10、17/10、9/2、25/4。这样的选目选量与朱祖谋大异其趣,却与胡适的《词选》暗相契合,它们选量之比分别是辛弃疾 40/46、苏轼 23/20、陆游 11/21、朱敦儒 9/30、刘克庄 12/16、姜夔 10/9、史达祖 2/7、吴文英 4/2,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对胡云翼的潜在影响,胡云翼的《宋词选》在解放后的 50 年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胡适的词学思想也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连偏好周邦彦的俞平伯和赏爱吴文英的龙榆生,在他们解放后编选的《唐宋词选》、《唐宋名家词选》亦大量选录苏轼、辛弃疾的豪放之作。“可以说,时到今日,胡适的理论已在大陆词学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6](第 229 页)

1978 年以后,伴随着大陆地区学术研究的“解冻”,词学研究也因之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词学界对胡适思想的关注,也由过去的沉潜水底再度浮出水面。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者,不再盲目推崇或故意贬低胡适,人们对胡适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化,他们在系统清理胡适词学观的前提下,然后对胡适的词学思想作合理的评判的。他们肯定了胡适对现代词学所带来的革新意义,正如谢桃坊所说的,胡适“从新文学的观点发现了词体文学的新的价值,建立了新的词史观念,提出了新批评与鉴赏标准……这些都构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新的词学研究格局,标志我国的词学研究进入了现代的发展阶段。”^[17](第 125 页)胡明先生也认为胡适对词学研究的意义是:“他建立起了一套薪新的词学研究框架和词史的认识观念,使词学研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把词学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阶段,或者说开启了一个词学新时代。”这些皆着眼胡适对现代词学的贡献,施议对则注意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词学界对胡适批评模式的突破,作者认为胡适以“意境——风格”论词的局限性是非常大的,把风格丰富多样的唐宋词统统归之“豪放”、“婉约”两派,这种简单归类显然是不合唐宋词发展实际的,而以吴世昌、叶嘉莹、万云骏为代表的词学家,或引进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或反对以豪放、婉约论词,或注意词的艺术世界的探讨,开始走出从王国维——胡适——胡云翼以来所形成的“意境——风格”批评程式,这一研究观念的转变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使我们对唐宋词史的认识重新回到了生机勃勃的真实状态。

综上所述,胡适在 20 世纪词学发展进程中扮演着的“角色”,不管怎样变化,他对于 20 世纪新词学的建设无疑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 20 世纪词学思想(包括文化思潮)变化的“风向标”。

[参 考 文 献]

- [1] 胡 适. 归国杂感[A]. 胡适作品集: 第 6 册[M].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86.
- [2] 沈卫威. 胡适周围[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 [3] 杜春和, 等. 胡适论学往书信选[Z].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4] 郑文焯. 梦窗词跋[A]. 龙榆生. 唐宋名家词选[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5] 唐圭璋. 词话丛编[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胡 适. 词选[Z].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7] 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8] 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M]. 上海: 中华书局, 1929.
- [9] 胡云翼. 词学 ABC[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3.
- [10] 陆侃如, 冯沅君. 中国诗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 [11] 柳存仁, 等. 中国大文学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12] 胡云翼. 中国词史略[M]. 上海: 大陆书局, 1933.
- [13] 三联书店. 胡适思想批判: 第 1 辑[Z]. 北京: 三联书店, 1955.
- [14]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Z]. 上海: 中华书局, 1958.
- [15]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M]. 上海: 中华书局, 1962.
- [16] 施议对. 今词达变[M]. 澳门: 澳门大学出版中心, 2001.
- [17] 谢桃坊. 评胡适的词学观点与方法[A]. 宋词辨[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8] 谷 永. 王静庵先生之文学批评[J]. 学衡, 1928, (64).
- [19] 胡先 ．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J]. 学衡, 1923, (18).
- [20]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21] 龙榆生. 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J]. 词学季刊, 1936, 3(3).
- [22] 胡 明. 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 诠释与思考[J]. 文学遗产, 1998, (2).

(责任编辑 何坤翁)

HU Shi and Chinese Ci Xue in 20th Century

CHEN Shui-y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Shui-yun (1964-),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i Xue(词学).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HU Shi's research of Ci put great impact on the Ci's new construction. In the 20s and 30s, he developed the thought of WANG Guo-wei's and criticized the most four famous poet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pinions protested him and supported him Ci into two genres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the genres “in the system” and “out of the system”. Later, in 1950s and 1960s, as an authority of bourgeois academic theory, HU Shi became the target of the criticizing. But his thinking was well-accepted by HU Yun-yi's The Selection Of Song Ci. Until 1980s, people began to adjust the attitude. The value of his theory of Ci has been beyond itself and the theory has become the weather-vane of the 20th century's theory of Ci.

Key words: HU Shi; thought of CiXue; 20th century; contestation; effect